

近代學人介紹之四

□秀先□

吳稚暉

(1865-1953)

——「悠悠宇宙，將無窮極，願吾朋友，勿草草人生。」

布衣一生親 文章百世尊 派異儒釋道 學究天地人
起居半閭閻 往來三家村 鷄犬逐庭戶 風雷轉乾坤
化身濯南海 正氣彌金門 國師永不朽 日月與長存

何志浩：金門吳稚暉先生水葬紀念亭頌詞



吳稚暉先生（一八六五—一九五三）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位特立獨行的怪傑。他在漫長的一生中，由「介」陋儒」進而為一維新派人物，最後更成了孫中山先生旗下的革命黨員，而和蔡子民先生同為「近百年來中國革命文人中的兩大柱石」。他歷經康梁變法，欣見民國肇建，又贊襄北伐、抗戰，還隨著政府兩度播遷，四五十年間，他常以開雲野鶴之身，而繫國家安危。先生又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一位典型的、勇敢的過渡期人物。他更是那些過渡期人物中轉變得最徹底最積極的一位，為了全心全意的宣揚現代化，他不惜乾淨利落地把傳統一脚踢開，以吳先生個人那種特殊崇高的地位，為此尚不能免於傳統主義者的詈罵，更不用說胡適之先生的挨盡圍剿了。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蔣總統稱頌先生是「我國當代一位偉大的文學家、哲學家、教育家、書法家、社會改革家，不但是國民革命的先覺，而且是 國父孫中山先生所特別推重其是

位革命的聖人。」當先生百年誕辰時，聯合國文教組織推崇他為百歲學人，這真是國人空前未有的榮譽。面對着這位從不肯草草人生的吳先生，我們的感觸又豈只是緬懷仰止之情而已，因請一論先生生平。

吳稚暉先生長在一個五世單傳的家庭裡，早年身世可以說得上孤苦零丁，六歲喪母，以後便寄養在無錫外祖母家裡。他七歲入私塾讀書，十八歲就開始教讀，二十三歲中秀才，二十五歲考入江陰南菁書院（當時全國最著名的書院）。先生說他入學第一天，去見山長黃以周先生，看到座案上寫着：「實事求是，莫作調人」八個大字，當時著實吃了一驚，他自稱一生只認得真理的是非，而不肯隨便調和，就是深愛着這八個字的啓示和影響。二十七歲鄉試中舉，第二年他到北京參加會試未中（是年蔡子民殿試中二甲進士），又回到南菁書院。有一天江陰知縣過孔廟而未下轎，為先生和書院同學所

見，認為「非聖無法」，便拾起石子擲擊，知縣大怒，將他們拘入縣署，後來經黃以周先生出面交涉，知縣承認拘捕舉人舉措失當，於是用轎輿和樂隊護送他們回去。事後，山長不願再留先生，他只好轉學蘇州紫陽書院。以後他又參加了兩次會試，不幸都沒考取。在參加第三次會試時，他曾列名康有為所發起的「公車上書」，稍後也曾和康有為見過面，彼此談得相當投機。戊戌年（一八九八）他又入京上書要求變法，那時節先生儼然一個維新份子。其時十年間，先生於平津教讀，他追憶當時的行徑簡直同一般書生無異：「在甲午（一八九四）以前，一櫛不知革命為何物，但慕咬字嚼字的陋儒。經甲午慘敗，始覺中國不能不學西方工藝，學了西方工藝，才能造大砲和機關槍，抵抗敵人，所謂『興學不容緩』乃開始冒充為維新派小卒，以後受了許多刺激，才一步一步的『浪漫』起來。直到癸卯（一九〇三）正月，在上海張園演說，演高興了，

才開始說稱革命。」由「冬烘先生」而言維新，更從維新進而宣傳革命，是先生思想上兩次重大的調整，對他一生的影響不可說不大。

先是先生受聘於上海南洋公學，前後凡三年，就在那兒他結識了蔡子民先生。辛丑年（一九〇一），他和學校當局意見不合，請求學堂補助旅費赴日本自費留學，先生在日本居留不過兩年，又鬧出了一件大事。當時他和其他留日學生，爲了保送蔡鐸等入成城學校事，和駐日公使言語起了衝突，公使召來日本警察，以「妨害治安」的罪名，將先生等驅逐出境。在被押解出境的途中，先生氣憤已極，懷著絕命書投水，當場被警察救起。那絕命書寫著：「信之以死，明不作賊，民權自由，建邦天則，削髮維新，片言可決。以尸爲諫，懷憂曲突。唏噓悲哉，公使何與。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亡國之慘，將有如是，諸公努力，僕終不死。」過了好多年以後，先生自己認爲「詞氣之間，還忘不了忠君愛國，仍去革命黨尚遠。」恰好蔡子民先生那時剛到日本，惟恐先生再生意外，便陪着他回到上海。當先生留日期間，中山先生常往來於日本，雖然他久聞中山先生大名，但那時他還自居爲一個維新派人物，又目孫先生爲江洋大盜似的亂黨，加以傳統的頭巾氣息尚在作祟，所以儘管他的朋友告訴他中山先生「像一個書生，他的氣度溫和端正得很，我生平未見第二人。」他還是將信將疑，始終不肯去見孫先生，直到三年後（一九〇五），他們兩人才在倫敦訂交。

壬寅年（一九〇二）先生回到上海，十月間和蔡子民、章太炎諸先生組織愛國學社，任國文教員。後來學社利用蘇報爲機關「鼓吹罷學，與夾帶革命，雙方並進。」先生又和學社同人，借張國政公開演說，倡言革命，這是他獻身革命運動的開始。

次年愛國學社內部意見紛歧，瀕臨解散的局面，接着又發生了驚天動地的「蘇報案」，先生雖列名「逆犯」名單中，却未被捕，因而引起了章太炎的誤會，厚誣先生通於清吏，吳章兩人交惡，後來更在宣傳革命的刊物上互相攻訐，「這不僅使這兩私人交破裂勢成水火，並且幾乎影響國民革命大計。」先生爲了走避當局的追捕，便在他三十九歲那年（一九〇三）出亡英倫，後來又把家眷接到英國，在最惡劣的物質環境下，從事一種「移家就學」的試驗。先生留歐期間，衣食所需，全賴筆耕，「非寫字吃飯，無飯可吃。」窘迫之狀可想而知。孫中山先生就在他到達英國的第二年，和他見了面，兩人互道傾慕之忱，而後展開了他倆風義師友的情誼。民國十四年，中山先生逝世時，吳先生是遺囑的見證人之一。乙巳年（一九〇五），先生加入同盟會。在爾後的幾年裡，他和張靜江、李石曾諸先生，在巴黎合辦新世紀週刊，發揚公理，鼓吹革命。他在新世紀上發表的文字很多，「先生當年雄健犀利的筆鋒，集中於幾個重大問題：即排滿，斥爲立憲、驚醒國魂、告誡黨人，及本科學觀念，倡導新道德、新教育是。」那時候新世紀和遠在東京的同盟會刊物民報，遙相呼應，對於中國留歐學生和華僑思想的啓發上有過重大的貢獻。

民國成立，中山先生出任臨時大總統，先生應邀回國。孫大總統迎接他到總統府同室居住，商談國事，並準備發表他爲教育總長，先生力辭不就。在總統府住了四天後，他又回到上海，以後就經常往來於京滬之間。元年五月蔡子民先生擔任教育總長，邀他進行國語注音字母的工作。第二年先生主持國語讀音統一會，歷時三個月，先後審定了常用字六千五百餘字的國音。而爲了決定一種通用的記音符號，大會起了爭論，最後才決定採用章太炎先

生發明的記號，定名爲「注音字母」（後來改稱注音符號），先生不念舊惡、虛懷若谷，「不因私人恩怨意氣妨害公務大計，這是最好一例。」民國六年，先生擴大讀音統一會的成果，手編第一部的國音字典（一萬三千餘字），而爲「語同音」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等到這本字典出版後，全國各地掀起了國語運動的高潮，他撰文演講日不暇給，其樂可知。民國八年以還，先生領導教育部的國語統一會垂三十年之久，所有推行國語的法令辦法，都有他的心血在內。台灣光復後，推行國語的績效，爲他老人家所親見，「他聽到國民學校的學生說的標準話，很感到滿意，說他們比過去一般人說的藍青官話，漂亮多了。」先生「畢生致力的一件基本工作，便是統一國音，展開國語運動。其動機是在提高一般平民的智識水準，其效果則見之於國語的普遍，由『書同文』而『語同音』，爲全民族奠定了精神上感情上統一的深厚基礎。」「語言一聲，統一中國」正是他老人家念念不忘的一樁大事。

民國二年八月，二次革命失敗，他和蔡子民先生全家乘輪西行，先生再度亡命英倫，生活清苦一如往昔。有一段時期，他住在黑人雜處的區域中，以廉價搜購得來的死魚爛肉爲食。民國五年先生回國辦報，六年蔡子民先生出長北京大學，聘他爲北大學監，辭未就。九年北京中法大學成立，李石曾先生擔任董事長，先生爲了實現他在海外建立大學的理想，打算在里昂設立中法大學分校。民國十一年他率領一百幾十個學生來到里昂，先生親任校長，主要的目的就在溝通中西文化。因爲當時他有個構想，認爲「外國書不能譯，中國書亦不能譯，只能治。」他又想在上海辦個出版機構，在外國聘請中國學者專治外國書，然後將它的大意寫出來，不必直譯，同時請外國學者作顧問，以便遇有疑難的

地方，可以隨時請益。先生辦理里大的目的多少也是爲了這個理想，不過人材經費兩難，以後始終不曾實現。至於由他和李石曾先生等發起、經手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更是一件大膽的嘗試，但結果並不太理想。原來在民國九年到十一年兩年間，有著爲數將近兩千的學生，在他們鼓勵下先後出國，想以「勤於作工、儉以求學」的方式，從事進一步的深造；殊不知這羣來到了人地生疏、言語不通的法國，但未脫士大夫氣息的學生們，既不能工又不能學，落得貧病交加者有之，意外死亡者有之，情景十分淒慘。後來經過兩位先生不斷的向國內求援，政府家庭公私分頭接濟，大部分學生的生活才有了着落，但其中少數無助而忿怒的一羣，却被共產國際收買，成了中共早期的得力幹部。先生一番熱心，未能見諒於國人，辭職回國後，還發佈了一篇自計：「寒門不幸，害及自身，吳稚暉府君，痛於中華民國十二年一月三十一日疾終於北京。因屍身難得潰爛，權殯於空氣之中，特此計聞。新鮮活死人吳敬恒泣血稽顙。」以示昨死今生的決意。名史學家李璜先生是當年的留法學生，他沉痛地指出「留法勤工儉學失敗了，而失敗的後果，竟犧牲許多的優秀青年分子，且爲國家貽留下一大堆禍害。」李璜先生的看法縱不盡屬事後諸葛，但勤工儉學的理想和實際有着相當大的差距却也是不爭之事，這或可說是先生的大醇小疵。

民國十三年，先生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並被推爲第一屆中央監察委員，以後他每屆都當選繼任，直到民國三十九年黨改造才轉任中央評議委員。先生一生布衣，不居任何官職，但却積極參與國事，「不在其位，而謀其政」是先生異於古人的地方。他又倡導一種新風氣：「官是一定不必做的，國事是一定不可不問的」終其一生，

他信守此言不渝。例如民國十七年十月，國民政府改組，推選他爲監察院長，先生堅辭不就，寧可從事統一國語的工作，並協助蔡子民先生草創中央研究院。又如林森主席逝世後，他幾乎成了國府主席的繼任人選，先生避之惟恐不及，說他閒散慣了，如果接見外交使節時，看到那套繁文縟節而發笑起來，豈不有失體統。「結果，還只能讓他高臥在風雲圈的邊緣。」「他常以大觀園的劉姥姥自況，其實這一大觀園，並不富於風情，而多不測風雲。他只是昂起頭來或拖幾次脚步，設法把緊急過度的風雲，吹得輕淡一些。」事實證明「每值危疑震撼，吳（稚暉先生）仗義執言，輒有澄清局勢之功。」

清黨之役便是個中最著的一端。民國十五、六年間，北伐軍節節勝利，而共產國際利用中共來控制中國的陰謀也日漸明顯，先生在那緊要的關頭，以中央監察委員的資格，挺身而出，向在上海集會的監察委員們提出「舉發共產黨謀叛」的呈文，獲得了一班元老的支持。這位共產黨人心目中的「無盔甲的袁世凱」，又和蔣總司令及蔡子民先生朝夕討論清黨大計，稍後前方的將領也同意實施清黨，一時岌岌可危的局勢，便急轉直下了。胡適之先生在清黨後二十六年，回顧當年的史實說：「若沒有『清黨』『反共』的舉動，中國大陸早已赤化了二十多年了，也許整個亞洲也早已赤化多年了。所以我們從歷史上回看二十六年，才可更深刻的了解當時蔣介石先生清黨反共的重大意義，才可以更深刻的了解吳稚暉先生舉發共產黨陰謀叛國呈文的重大意義。」不止如此，他還承認吳先生等元老當時所發出的「這種道義的力量，在我們無黨派的自由主義者的心目中，是確曾發生很大影響的。」足見先生的議論眞具有着一言興邦同一言九鼎的力量。先生平素致力於國家的統一和進步，對那些心存異動的

人，他都不稍假顏色，大肆撻伐，汪精衛叛國時，他就曾不憚其煩地揭發汪只圖私慾而置國家利益於不顧的許多事實。先生經世之功大抵如此，而其道德文章猶有可觀者。

先生一生爲文，「喜笑怒罵，純任自然」他的文風真是別開生面，既不避俚語俗語，也不忌諱什麼，男女之事、精蟲孕蛋之類統統上了他的大塊文章。他生平最重要的一篇論文——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其中就曾以十分之一的篇幅來討論「神工鬼斧的生小孩人生觀」。又儘管他的文筆出神入化，但他最不喜歡被人看成一個文學家，他常說「一爲文人，便無足觀」，所以他從來不曾裝腔作勢的爲作文而作文。他承認三十歲前，多少還有點矯揉造作，「然而心上終覺得雕蟲小技，壯士不爲。爲什麼學劍不成，一定要學書必成，過那俳優的生活，還要將來做那災梨禍棗的害蟲呢。假如有什麼說的話，自然愛說便說，何必有什麼做文章的名詞，存在心頭呢？」就在他三十一歲那年，偶然在小書攤上翻到一本極平常的小書，書名就叫「豈有此理」（按即「何典」），劈頭兩句，便是「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他只看了這兩句話，就頓悟到一個「作文」的秘訣，那便是有話便說，不用再顧慮到什麼聲色格律了，「用這種精神，才能得言論的眞自由，享言論的眞幸福。」於是他的文章從此充滿着潑辣痛快、明朗負責的氣氛，更洋溢着無限的活力，令人讀起來覺得虎虎有生氣。

先生在思想上的表現，也同樣地毫不含糊，快人快語了無拖泥帶水的現象。一般說來，他一生思考的重點，都可以在參與科文論戰時所寫的，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那七萬字的長篇中，見其梗概。例如他對宇宙的看法：「在無始之始，有一個混沌得着實可笑，不能拿言語來形容的怪物，住

在無何有之鄉，自己對自己說道，悶死我也！這樣的聽不到，看不見，聞不出，摸不着，長日如此，成年如此，永遠如此，豈不悶死人嗎？說時遲，那時快，自己不知不覺便破裂了。這個破裂，也可以叫做適如其意者，所謂求仁而得仁，頃刻變起了大千宇宙……終之他是至今沒有變好，並且似乎還沒有一樣東西，值得他愜意，留了永久不變。這是我有的宇宙觀。」像這種「漆黑一團」、不怕麻煩、進化無已的宇宙，絕不是中國人傳統上那種靜態的、有情的宇宙。「宇宙是一個大生命」，它的變化不待上帝、靈魂、精神元素等假手，而只是純粹的自然變化罷了，這等想法又顯得那麼勇敢，再明白也不過了。至於他對人生的看法，不但平實，而且饒有教育意義，「人便是外面止膾兩隻腳，却得了兩隻手，內面有三斤二兩腦髓，五千零四十八根腦筋，比較占有多額神經系的動物。」「生者，演之謂也……生的時節就是鑼鼓登場，清歌妙舞，使槍弄棒的時節，未出娘胎是在後台，已進棺木，是回老家。」「所謂人生，便是用手用腦的一種動物，輪到『宇宙大劇場』的億兆八京六兆五萬七千幕，正在那裡出台演唱，請作如是觀，便叫人生觀。」他又正告我們「既有了人生……把演唱的脚本要做得好好的，然後不枉一登場。」「這個大劇場，是我們自己建築的，這一齣兩手動物的文明新劇，是我們自己編演的，並不是敷衍什麼後台老板（按即信奉上帝、服從權威、崇拜偶像等），貪圖趁幾個工錢，乃是替自己盡義務。」總之，先生要大家體念「悠悠宇宙，將無窮極」而「願吾朋友，勿草草人生」了。

說到吳先生個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見解，那相當地不中人聽。他很簡要地指出，古代的中國人只是一個安份守己、茹苦耐勞的老實農夫，沒有什麼

幻想，除了原始的迷信和禁忌外，不能建立任何宗教。孔孟老莊興起之後，治國平天下的思想和樂天知命的看法同時並存，因而造成了普唐以前「一個鄉老（老莊）局董（孔孟）配合成功的社會。」等到佛教傳入中國後，理學家們拿它雜揉傳會在儒家的治道上，於是南宋以後的社會，便變得十分乾枯，而和孔聖人孟賢人的溫溫和和教人自然者大異旨趣了。那些受了理學薰陶的知識份子，「着衣也不曾着好，喫飯也不像喫飯，走路也不像走路，鼻涕眼淚亂迸，指甲內泥污積疊。」針對著這些事實，他給傳統文化下了個絕情的判斷：「道德低淺」。（先生說過「我信道德乃文化的結晶，未有文化高而道德反低下者。」）對照之下西洋那個「算賬」的民族，「他們的總合道德叫高明」。這等駭人聽聞的結論，在四十年前自然引起了一陣騷動，即使是在四十年後的今天，他的微言大義仍有值得我們三思的地方。其實先生也不過是上紹顧亭林、顏習齋、戴東原諸人的餘緒，反對那空談心性，無補於民生日用的理學而已。（胡適之先生推崇他為三百年來反理學的四大思想家之一）至於「以淑世為惟一之鵠的，故不輕視事功」的孔孟精義，先生是不妄加反對的。

終先生一世（甚至於今天），他最遭人物議的地方是對於「國故」的看法。他曾和南菁書院的一個老朋友「私把線裝書投入毛廁裡去」，他又公開的警告大家「這國故的臭東西……非再把他丟在毛廁裡三十年。現今鼓吹成一個乾燥無味的物質文明，人家用機關槍打來，我也用機關槍對打，把中國站住了，再整理什麼國故，毫不嫌遲。」只要考察一下他當時說話的背景，我們便不難了解他是有感而發的。民國十一、二年間，一方面是梁任公、張君勱先生等，鑑於歐戰的慘烈，而發表了科學破產

說，他們的主旨無非是「科學是成就了物質文明；物質文明自促起了空前大戰，是禍世殃民的東西。」因此在對於物質文明喪失了信心後，他們想從故紙堆中找出些什麼東西來。另一方面則是新文學運動發展的偏差，陳西滢先生就曾指出：「可是很不幸的，提倡新文學的恰巧是胡適之先生，一個對於研究國故最有興趣的人……胡先生是在民衆心目中代表新文學運動的惟一的人物。他研究國故固然很好，其餘的人也都有了線裝書咿啞起來，那就糟了。新文學運動的結果弄得北京的舊書長了幾倍價……這是許多人常常引了來代新文學運動誇張的。」就在這種新舊人物都搶着在舊有的天地裡打滾的時候，吳先生出來做獅子吼了。「他認為中國如果在現實上不能站住，其他一切都將落空。爲了使中國在現實上能站住，所以全力鼓吹物質文明，又爲了使物質文明的發展減少阻碍，甚至不惜醜詆國故。」蔣孟鄰先生的經驗很可以拿來替這段話作註腳，他說民國十一年時他路過里大，應吳先生之請向學生講話，當時他認為在外國寫學，讀中國書的機會不多，便鼓勵他們有空時接觸一下中國書。不料先生等他一講完，登台就說：「某先生的話，真是亡國之談。這次世界大戰以後，沒有坦克大砲，還可以立國麼。那些古老的書還可以救國麼？望你們快把那些線裝書統統丟到毛廁裡去。」當年內外的情勢既然如此，這也就怪不得心直口快的吳先生會「口不擇言」了。其實先生的意思，並不反對由少數學者來整理國故，「周秦漢魏的漢學，是世界上人公共有維護之責的東西。」只要不落得全國的青少年們，個個都學樣抱殘守缺，而妨礙了新思想新技能的吸收學習時，那也就得了。對於「居心叵測」這類的欲加之罪，先生是不屑與辯駁的。

除了這些思想問題上的重要觀點外，先生還有幾條他個人的信仰，頗能發人深省：「堅信精神離不了物質」（物質文明為精神文明所由寄而發揮）「堅信宇宙都是暫局，然兆兆兆境，沒有一境，不該隨境努力，兆兆兆時，沒有一時，不該隨時改進。」（宇宙永遠在進化）「也（許）有少數古人，勝過今人。但從大部份着想，可堅決的斷定古人不及今人，今人又不及後人。」（因為進化不已，所以今勝於古，後又勝於今）「善也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後人。惡也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後人。知識之能力可使善亦進惡亦進。」（善惡都在進化中）物質文明愈進步，品物愈備，人類的合一，愈有傾向；複雜之疑難，亦愈易解決。」（所以物質文明值得信賴）「宇宙一切，皆可以科學解說。」單就這六項來說，先生畢生思想的骨幹，幾乎已包羅無遺。科學究竟能否解釋一切現象，進化的結果是否必定優於過去，姑且存而勿論，但他這些信條中有很多都能搔到癢處，特別是對於一直相信「今不如古」和迷信精神力量的中國人，尤其具有鼓勵及警惕的雙重作用。先生思想的光輝應該是建立在這些基本的信仰上的。此外，先生對於科學、工藝的倡導也不遺餘力，他所寫的「上下古今談」，便是一部通俗的科學小說，遠在六十年前（一九〇九）他老人家就能有這等眼光和魄力，真不是一般等閒之輩所能想得到做到的。在發展科學的過程中，有着許多思想上的障礙，先生首先便針對着那種以為「精神以外無長物」的「精神生活」，展開無情的批判，甚至譏諷那種屈服於自然的生活態度為「牛羊的精神生活」，「只有科學發達了，手執毒氣飛彈，口說博愛平等，世界才可進入大同。」另外就積極的一面來說，他明白的表示「科學本身，原是永永有益人類的一種動力。」「世界的

進步，只隨品物而進步。科學便是備物最有力的新法。」至於先生提倡科學的方法那踏實得很，務必使青年人人習於勞作，「科學是工藝的母親，工藝是科學在日常生活上的應用。」對於多少還存着傳統那種勞心而不勞力觀念的中國知識份子，吳先生這番話無異暮鼓晨鐘。他又有鑑於我國的科學工業落後，國力不張，所以顧不得急功近利的譏評，主張大學應以應用為先，先生遂說他「一向相信斧頭鑿子，主張設專科學校，造就工程人才。」甚至於為了矯枉過正，他不得不要求人家「裝飾牆壁與其掛字畫對子，不如掛鋸子、掛斧子。」鋸子、斧子都是最簡單的勞作工具，也是「機械的簡單代表，可以用以製造物質文明的。」那意義便更加不平凡了。「用兩隻手去做工，用腦力去幫助兩隻手製造機械，發明科學，製造文明，增進道德。」是先生提倡科學、工藝的最終目的。

儘管先生是昌言物質文明最力的人，他已不得不人人都有寬敞的房屋、奢華的陳設，出門有汽車代步，但他的生活却反其道而行，住的是「斗室」「寄舫」，吃的是自己燒的飯菜，冬天穿一件老棉袍，出門則安步當車，不坐人力車。政府為他蓋了一所小房子，他不肯搬過去住，他說他像那住慣豬圈的豬，壞房子住慣了。如果把豬欄搬到洋房裡，豬豈反而要生病的。先生刻苦自持，有人以為矯情，殊不知先生「素貧賤行乎貧賤」，這種安貧樂道的生活，他已經行之有年了。先生在家乘上寫道：「吾祖死，貸人松木板作棺，棺縫糊以紙，吾母殮具不能實棺，以稻草足之。吾甘長貧賤，亦得如斯送終也。」他一生最怕繁文縟節，屢次以外祖母遺命說他是「偷來人身」不能過生日的典故來辭壽，他又遺命海葬，早年清苦的生活，實在留給先生很深刻的印象。他曾有一篇遺囑，將他晚年的各項收支

算得一清二楚，然後寫上「恰當」二字，立遺囑後又有了點收入，他希望將那點錢轉送親戚，並在遺囑上加了一句：「生未帶來，死乃支配，可恥。」先生一生窮而益堅，不苟取予，這是最好的寫照。

他自稱「我的腦筋極新，我的手段極舊。」蔣孟鄰先生就曾說過，先生之所以過著類似苦行僧的生活，正為的是「中國物質未具備，以節儉作為『返本自適』之代價耳。」（先生有言「物質備具，充養吾之精神……而後偶任吾個體之返本自適，遂有若天地甚寬，其樂反未央耳。」）先生又最富平等精神，「一個聽差提了開水壺進屋道：『臉水來了，吳先生。』吳先生答道：『已經用過了，王先生。』」蔣經國先生也說，當他從學於先生時，有人送他老人家一輛人力車，他叫蔣先生把車子的兩根拉桿鋸掉，而後抬到書房裡，充做沙發椅，接着先生說話了：「一個人有兩條腿，自己可以走路，何必要別人拉。」先生人格的圓滿具足已經到了完人的境地。

吳稚暉先生是老一輩學人中一個突出的代表，他的心靈開放活潑富有創造性，雖然他的思維多少受了基本訓練不足的影響，無法獲得更充分的發揮，但他在加速中國現代化的步驟上，以及掃除傳統的迷霧上都曾有過非凡的表現。他一生精進不已，思想生命之長在中國近百年歷史中，幾乎無出其右者。他的生活態度也提供了我們一個很好的榜樣，「先生一生愛好是自然」「力避塵囂，不受繁文縟禮的羈絆。獨來獨往，視富貴如浮雲」之餘，他還是忘情不了國家民族，這也就是說他具體實現了原始儒家的淑世精神。「古人不及今人，今人又不及後人」，我們絕不能輸給這位「白頭新人物」的吳稚暉先生！